

中国改革历程中的 “目的-手段”机理变迁

金 碚

[摘要] 人的行动总是出于一定的目的,并且采取或寻求一定的手段来努力达到目的。承认和实行市场经济,意味着经济运行的“目的-手段”机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个面貌。人类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就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从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工具主义的财富观中进一步觉醒,升华为本真价值观的觉醒。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视角看,体现“目的-手段”机理机制的新动能,其“方向的自觉性”都要展现创新、自律、理智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 经济改革 “目的-手段”机理; 工具理性; 本真价值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 (2018) -05-0005 (07)

[作者] 金 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如果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观察和认识人类的经济活动,经济学必须基于一定的思维逻辑,即假定人的行动总是出于一定的目的,并且采取或寻求一定的手段来努力达到目的(当然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也就是假定人或人的集体(企业或国家)是有行为目的和行为能力的经济主体。不同的经济学学派对于人的行为目的如何产生,是基于人的本能(人性)、心理倾向(爱好)还是由一定的客观环境(社会条件)所决定,持有不同的理论主张,但(明确的或隐含的“目的-手段”范式是大致一致的认知框架。如果把人的行为目的设定为“期望达到的幸福”,所采取的手段则是“必须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的选择。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强调生产之目的是满足人们“期望达到的幸福”,如何处理“必须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的关系,就比较明确了。以这样的认知框架来观察和分析中国40年来的经济改革历程,可以看到,经济体制的“目的-手段”机理发生着根本性变迁,可以解释一系列现象背后的逻辑,并预示未来的道路。

一、实物目标与计划经济设想: 求变动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极度落后。恢

复和发展生产,达到一定的实物产量,使人民能够“吃饱肚子”“有衣可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是最重要的经济目标。所以,实物生产,如粮食、棉花、布匹、钢铁、煤炭、石油等产量是国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经济发展状况是否满意,首先看这些实物性指标所达到的水平。

以此为经济发展目标,可以而且必须采取国家指令性计划方式,直接下达各种产品的生产量实物指标,要求生产单位(工厂、农村生产组织)承诺完成。这就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预想的由国家计划中心向生产单位下达生产任务计划,生产单位组织生产活动以确保完成指标任务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形式上的相似性和执行方式上的类同性。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动员性资源调动配置。例如,将军队转业干部和年轻的复员退伍军人投入生产建设,组建生产单位,直接“攻克”计划指标,并且鼓励“超额完成任务”。

按照这样的认识和思维逻辑,人们往往会在强烈的动员性热情中,以为只要计划到位,指令明确,凭借生产热情和政治动员,就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指标,重要的只是必须发挥计划经济的动员力。于是,原先作为战时和战后经济的动员性手段的国家指令性经济计划体系,转而成为期望达到的目的,即试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实行计划经

济制度。由于手段成为目的，原先是体现目的的经济指标就反而成为国家经济计划的行政性手段，而在具体执行中，作为国家经济手段的指令性经济指标，又成为各生产单位的生产行为目的，即为了完成国家指令性经济指标而生产，一切经济活动都变为“服从性”的行政执行行为。

这样，从“目的-手段”的机理逻辑看，计划经济在制度逻辑上不仅必须是以实物生产量作为目标的，而且经济计划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性指令体系，如果背离实物性计划指标，就会破坏计划经济的制度逻辑。所以，背离实物性计划的行为，就会被认定为“破坏计划经济”，破坏计划经济就是“违法”行为。计划经济就变为严格的行政性组织行为，必须高度依赖行政体系才能推动经济运转。在这样的“目的-手段”机理体制中，事无巨细都是执行计划。在那样的制度体系中，没有人可以超越行政性的管制框架。这样的制度系统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未将在体系内的“边缘成分”吸纳进体系之内。实际上，那些“边缘成分”也具有进入体系内的强烈动机，因为只有进入这一体系内才算是“正规”地进入了国家经济体系中，在此之外的经济活动均属于不正规的“低级”成分或“低级”形式，其从业者也当然只能拥有低级的甚至是边缘化的社会身份。

在这样的体制下，尽管人们也是努力工作的，还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活动，“劳动模范”“生产标兵”层出不穷，但生产效率却难以提高，生活水平始终处于非常低下的状态。“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实物目标，以及以指令性计划指标为手段的经济机理，无法激励效率提高和实现物质丰富的目的，实际上连如何进行经济核算来衡量经济效率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计划经济无论在理论上表述得如何“完美”，在制度上执行得如何“规范”和“严格”，但其运行效果总是难以达到预期。与此相应的是，居民的生活用品也实行实物供给体制，城市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品，粮食、纺织品、副食品、家具、家用电器等均须凭票证购买，住房也实行实物分配制度。这样的实物供应方式，不仅限制了消费选择权和丰富性，而且供应数量也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只能依赖更为严格的票证制度来维持供求关系的勉强平衡，增长潜力非常有限，人民消费水平和生活状况总是难以令人满意。

因此，在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行中，一方面越来越强调以“严格执行”来达到目标；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完善计划经济”来使僵化的体制适应复杂的现实，挽回不令人满意的计划经济实施效果。但是，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目的，必然偏向于采取“政治挂帅”的社会运动方式；将执行指令性计划指标强制性地规定为生产单位的经营目标，必然偏向于忽视经济核算和效率激励的经济管理方式，而采取政治性的

动员方式和意识形态灌输，即通过改变人的行为目标来服从于实现计划经济指标的体制逻辑。

1978年，当发展思维确立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认识到主观努力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后，把实行经济计划从制度“目的”，回归为经济计划和市场调节都是“手段”，而认同创造物质财富为经济发展“目的”，就成为顺理成章的改革思维方向，于是变革的动因起始于对价值规律和财富观念的反思。过去既然目的被扭曲，手段不可行，那么，进行根本性变革就成为必然。

二、财富觉醒与市场经济取向：改革走势

在计划经济设想的“目的-手段”机理体系中，价值规律是异己性的，因为实物性生产指标是以实物量单位为计算尺度的，如果以价值规律作为计划经济运行规则，就难以体现计划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要求。在没有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根本不存在价值或价格的发现机制，实际上是找不到可以有效使用的价值工具和经济核算方式的。既然价值规律是异己的，那么追求财富的行为也必然是异己的。所以，按照计划经济设想，在意识形态以至法规政策上，追求财富都是不正当的，甚至是违法的。因为，如果不计价值地生产和囤积实物，会导致物质耗损浪费或者冗余闲置（库存而不消费），而没有实际的财富意义。当财富失去经济功能，即在否定了财富正当性的体制中，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就失去了动力，贫穷就成为必然。总之，否定财富，经济运行和发展就会缺乏有效的“目的-手段”机理，堕入无速状态（没有经济增长机制）。

因此，如果要以实现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为目的，那么经济改革就必须从认可承认追求财富的正当性的价值规律开始，财富觉醒，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经济才可能起飞。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反思就从关于价值规律的讨论开始，认识到只有服从价值规律才能实现经济发展。而承认价值规律就必须承认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即经济行为必须以效率为中心，进而必须要进行经济核算，而可行的经济核算只能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因为作为价值形式的货币，是唯一可以作为统一计量单位进行加总性经济核算的工具（尺度）。

以货币计量的财富同实物财富的差别是，前者是“无限”的，而后者总是有限的，超过一定量就会“过剩”。所以，以作为价值形式的货币额为经济活动目标，就赋予了经济动力以“无限”性和效率可比性。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富裕的标志显然是货币性的，即以达到一定量的可以货币单位计算的财物收入或存量作为是否“富裕”的标准。于是，创造更多的收入和利润，成为各生产单位的

经营目标,这就必然冲击以实物量指标为生产目标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著名口号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因此,反思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何者更具历史必然性,进而呼唤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变革,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方向(以及理论争论的焦点),称之为理论的“思想解放”。回顾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和清晰脉络就是越来越明确和强调承认市场经济及其调节机制的地位和作为。官方的正式提法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承认和实行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或决定性作用,意味着经济运行的“目的-手段”机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以政治第一(“政治挂帅”)为目标,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发展生产力,实现物质财富增长,“富起来”来是人心所向;另一方面,财富目标体现为以货币单位计算的价值量,即使是关于使用价值量的核算也必须转换为以货币单位计算的统计数据,例如,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样,如果从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视角来观察,经济活动的目标就从主要体现使用价值的实物侧转变为财富的价值形式侧即交换价值。与此相应的是,实物生产转而为获得作为价值形式的交换价值量(货币额)的手段,生产出实物产品,如果不能转变(销售)为货币形态,其价值就没有实现,属于“过剩”现象。

经济改革所指向和实现的“目的-手段”机理的这两个根本性转变,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强大社会能量,神奇地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个面貌(常常被称为“经济奇迹”)。从世界近现代历史看,工业化总是同市场经济紧密相连,市场经济是工业化的强大推动力和实现机制,工业化进而可以形成市场经济向各领域全面渗透以至导致全球化现象(将所有国家都卷入其中)的巨大动能。工业化需要两个互为条件的加速因素:生产和交换。科学技术的工业化运用激发了强大的生产力,大规模生产是工业化的本性,而市场经济的“交换”性,可以使工业化的社会分工特性和大规模生产及大众消费本性得以极大张扬。40年来,中国经济在市场经济的“目的-手段”机理推动下,工业生产的迂回性充分延展,各领域的产业链不断延长扩展。在此过程中,工业材料、能源供应、产品设计、零部件生产、加工组装、营销物流等产业分工关系日趋复杂交织,同时,由于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过程形成巨大的供应链和产业系统,使得每一个环节都可以从生产体系中的一个“手段”功能,转变为该产业环节生产者和参与者的特定生产“目标”,同时各生产者和参与者又将各自

的生产目标,转变为追求体现自己经济利益的工具性目标——收入和利润的手段。总之,市场经济使得国民经济中各生产、流通和分配活动的参与者,在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以提供各自在分工环节中的产品或服务的方式(手段),实现(追求)工具性目标——获得财富索取权——货币。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这样的“目的-手段”机理是非常有效和极为强大的。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市场经济是一个最伟大的制度创造。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所推动的高速工业化,是市场经济机制体制高度有效和强大力量的充分体现。与此相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消费品供应彻底摒弃了票证分配制度,完全实行市场调节的供求制度,连城市居民住房也取消实物分配,实行货币化供应,即市场化的商品房制度。4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消费品供求极大丰富,相当一部分居民富裕起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居然在短短三四十一年间就从“贫穷”变为“有钱”!

同样的国度和人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创造出非常不同的经济业绩和导致完全不同的工业化态势。计划经济以钢、粮、煤等实物为“目标”,虽然竭尽“干劲”,但始终处于实物短缺状态,欲物而不足,欲速却不达;市场经济以“收入”“财富”“利润”“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交换价值指标为目标,放开手脚,就使经济体充满活力,生产规模大幅扩张,物质财富极大增长。

三、价值形式驱动与金融地产繁盛:亢奋增长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目的-手段”机理具有反转性特征,即作为经济活动目的的使用价值(实物)在市场机制中转变为追求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的手段,而原本作为经济发展手段的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却转变为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且整个经济分工系统中的各个微观经济主体都在这一关系反转的“目的-手段”机理体系中发挥生产积极性和产生追求工具性目标的极大欲望力量(有学者称之为“贪婪”的人类心理动因)。

从经济理论上说(或者经济理论试图这样做),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物质财富是“真实”的财富(称为“真实量”),而其表现的货币量则是其“名义量”。经济理论和研究所分析的主要是真实量关系(尽管采用货币单位),只有当引入了“预期”等心理因素或研究通货膨胀等现象时才关注名义量。所以,经济理论分析中所假定的“目的-手段”行为逻辑中的“目的”通常是(或假定是)真实量,否则就被认为是“非理性”的。问题是,在现实经济中,所谓“真实量”和“名义量”实际上难以截然区分,因为“价格”本身就是以货币单位来表现,而要区分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只能是思维中

的游戏。

因此，在市场经济反转的“目的-手段”机理中，总是伴随着“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机理关系反转，而且，交换价值总是表现为其纯粹形式——货币。而货币形态本身的发展也已经过了漫长的历史，今天的货币已经既不是商品本位、金（银）本位，也不再是（美元）金汇兑本位，而已完全是信用货币，进而还可以发展为“数字”货币，总之，任何可以被接受的东西都可以被视同为“货币”，具有货币性“财富”的价值。不动产就更是可以货币化，如同样一座房子，其财富价值取决于其“价格”，并且未必是交换中发生的价格，而是“评估”价格。同样，对公司的“估值”也会脱离其真实。一家严重亏损的公司，只要大家认为（或者是大家认为其他人会认为）它“前途可观”，公司“估值”就可能连连高升。只要你“相信”，或者你相信“其他人会相信”，那么其经济价值就是可以“信以为真”的。

如果经济运行越来越具有货币目标特性，货币金融以及作为货币金融伴生现象的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机制就会发挥更强烈的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就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这样的显著特征，即金融地产因素成为推动“亢奋增长”的巨大力量。几乎是无论什么产业，企业创业和投资的第一个行为大多数都是“买地”“圈地”，只要有了“地”就可以获得“钱”，至少可以“抵押贷款”而获得“流动性”。地方政府规划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行为也往往是“划地”“圈地”，然后“卖地”筹钱，“以地生钱”。居民改善生活和增加家庭资产的行为也是“买房”，房产的名义价值（价格）成为城市中产阶级最大的家庭财产构成部分。而这样的庞大房地产资产（其名义价值据估已超过 GDP 数倍，达 400 万亿元之巨），主要是金融活动（借贷款）的产物。

如果进一步讨论就不难看到，在以金融活动为主导的“目的-手段”机理中，一切都可以“货币化”，即以货币金融手段，实现货币金融价值增长的目的，这通常就被称为“虚拟资本”增殖或“虚拟经济”现象。它与实体经济活动的“目的-手段”机理相脱离，即与满足人的实际需要相脱离，而成为主要是满足货币数字增长欲望的游戏（以货币数字的不断增长而获得满足感或“快乐感”）。这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难以应对的社会现象。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统计数据中，也可以看到，大致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就体现出金融地产驱动的显著特征。作为价值形式的交换价值表现出强劲扩张态势。2017 年底，以 M2 计算，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为 170 万亿元，同年的 GDP 为 82 万亿元，两者之比为 2.1: 1。而被称为“金融资本主义”的美国，这一比例为 0.9: 1。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中国 2016 年底为 8.4%，2017 年底为 7.9%；

而全球仅为 4.1%。美国的这一比例较高年份：2001 年为最高点，达 7.7%，2006 年为 7.6%，这样高的比例被认为可以预示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日本的这一比例 1990 年达到 6.9%，被认为过高，随后爆发经济危机。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金融抑制”特征，金融业不发达，金融资产不会占比很高，否则可能爆发恶性通货膨胀。而在中国，尽管金融体系还不够发达，但货币量和金融业的比重却已相当高，似乎到处都表现得“很有钱”。过去通常认为，中国人是不太愿意借债的，但有学者指出，现在以家庭债务/家庭可支配收入测算，中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高达 110.9%，甚至超过了通常被认为更愿意借债的美国，后者的这一数值为 108.1%。不过，尽管金融和债务规模大幅度提高，但中国经济似乎仍处于可以“适应”的状态，并未爆发恶性通货膨胀（国家货币金融管理部门也总是很有信心地判断“风险总体可控”），而只是表现为资产价格，最突出的就是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幸运的是，中国经济并未因此而崩溃，也许是因为，中国经济凭借其非常高的储蓄率支撑，具有对货币金融更强依赖性和承受力的特性。这还表现为，地方经济高度依赖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率非常高，如果不是由于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政策，限制地方政府扩大负债，中国经济的高负债率现象可能更为突出。因此，在进行经济调整中，“去杠杆”成为重要目标之一。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而否定货币金融业的发展。货币金融是经济运转的“血液”，经济实体与货币金融深度“纠缠”，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目的-手段”机理本身具有的高度复杂性和关系反转颠倒的特性，它的运动是快速“旋转”不断“循环”的，各种因素的位势“置换”“偏移”是时刻发生的。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和断面来观察，市场经济中各种行为和现象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甚至是难以确切定义的），往往是从一方面看是“手段”，从另一方面看则是“目的”；对于一些经济行为人是“手段”的，对另一些经济行为人可能是“目的”；相反，一些经济行为人所追求的“目的”，对另一些经济行为人来说却是“手段”。例如，对于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经济活动而言，“赚钱”当然只是手段，但却表现为众多经济活动的“目的”。与“赚钱”相对应，产品的使用价值应是“目的”，但生产有用产品却表现为获取货币收入或利润的“手段”。从经济发展的本质看，GDP 当然是手段，但在现实中却成为最重要（显示性最强）的目标性指标之一。金融活动只是经济活动的交易方式，货币是交换中介，金融应为实体经济服务，当然属于“手段”侧，但在现实中，以至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追求货币增殖（赚更多的钱），往往成为工具理性主导下的行为“目的”，甚至是终身追求的目的。因而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资本家只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的本性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行为目的都被认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或“实现出资人收益或资产最大化”。

无论是以什么“最大化”为目的,在经济运行中都表现为某个货币形态(至少是可以货币单位计量)的指标最大化。例如,以某某数值的收入水平作为达到是否“脱贫”的指标,以到达多少年收入水平作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指标,以拥有多少可投资资产净值作为高收入阶层的标志等。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也是采用“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这类可以货币计量的指标。而这类作为“手段”的工具性指标,在现实中以至人们的观念中,总是难以抗拒地转化为“目的”性的指标,人们竞相追逐这些指标,认为其体现或展示了达到经济发展目的的程度(成就)。如果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关系颠倒,那么可以反问:难道还有更具显示性、可比性和更易理解的指标吗?

以货币金融工具的“手段目的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往往可以促进经济亢奋,这可能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也可能表现为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前者反映了真实经济增长,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虚拟经济的泡沫膨胀。问题还在于,人们在观念上往往难以理智地区分“目的”和“手段”,因而在金融地产驱动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中,也往往难以理智地区分实质财富和虚拟财富。市场经济的交换本性决定了,实质经济或实物财富与虚拟财富是可以交易置换的,只要能够等价交换,就没有必要在意它究竟是什么东西。以此来看,最具交换便利性的当然是货币,所以“货币为王”“现金为王”,拥有货币才是拥有可以万变形态的有效“财富”。因此,亢奋增长的市场经济,往往倾向于“重商主义”,即视货币为真实财富。

在这样的“目的-手段”机理推动下,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一方面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很大的金融性资产。而金融性资产的快速膨胀,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以资产价格上涨所产生的财富增长和“有钱”“富裕”幻像(只要是已经拥有并且不想再买房的人,就会感觉自己挺“富裕”;而只要是想买房,就一定会感觉自己是严重缺钱的“穷人”)。不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所以,中国可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与过去关于中国主要矛盾的表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相比,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甩掉了“落后”两字,实际上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判断: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落后”,至少是以GDP总量计

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四、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本真复兴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一些矛盾也开始显现。人们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实际上就是将如何认识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提到了关注中心。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各国政府都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刺激政策,以货币金融手段,特别是投资扩张方式,遏制“自由落体式”的经济下滑。中国政府也是如此,并采取了非常强烈的举措。尽管取得了宏观调控的效果,保住了增长,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世界居首,但也为此付出了偏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较大代价。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即在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必须更深刻的反思经济发展的本真目的和本真价值,也要更科学理性地选择有效手段。笔者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经济发展根本的“目的-手段”关系体现人类发展的本真理性,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目标是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幸福,最终体现为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实现。而收入、利润和GDP等经济指标,归根结底只是实现人类本真价值目标的工具性目标,即实现本真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所以,进入经济发展新时代,就要更自觉地实现人类发展的本真复兴,使工具理性(以手段的目的化为特征)与人类价值目标(本真目的的自觉性)相契合。以工具理性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更自觉地达成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目标。实际上就是更自觉理性地坚持人类发展最本质的目的-手段关系。

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就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人类再次审视科学理性的根本价值目标,从“目的-手段”关系的工具性颠倒,回归其本来性质,即人类从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工具主义的财富观中进一步觉醒,升华为本真价值观的觉醒。更深刻地认识:市场经济的理性主义是经济价值(交换价值)主导的工具理性,手段驾驭目的;而人类发展本真的理性主义则是人本价值主导的目的理性,目的驾驭手段。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特别是进行工业生产,目的是将自然物质转变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物质财富,并进行财富囤积(积累),而这样的经济活动不应同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目标相悖,即不应违背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将原本对人无用甚至有害的物质转变为有用之物这一根本方向。即使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以工具理性主导,将无用物转变为有用物的行为,即使是服从于创造或获取经济价值,尤其是价值形式货币,也不应改变这一人类活动的根

本性质,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即经济发展必须以对人有实质裨益,对人的健康有利,使人居住环境适宜和生活愉快,为中轴原理和本真价值。

经济发展观念的再进步则将体现为:对于“以人为本”也不应作狭隘理解,以为只要是为了获得人的利益,就可以不顾及其他一切,为了使地球成为人类的乐园,就可以不惜牺牲其他一切生命体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人类的道德关切只是人自身。实际上,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和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有在这样的物质世界和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中,才能生生不息,健康生存和永续繁衍。所以,本真意义的以人为本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不能是除了自己之外目空一切的自私霸主。人类如果破坏了自然,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与和谐,也就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繁衍的最基本条件,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原则。按这样的发展理念,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反复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为了金山银山而损害了绿水青山,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发展的本真价值。

仅仅端正认识转变观念当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使理念转化为行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新挑战,即中国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实现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高质量发展将更自觉地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更加关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论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取向、行为目标确定,还是手段选择,都将更加具有“目的-手段”的抉择理智,体现科学发展的根本原则。由于发展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的,而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要求,还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所以,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动力的“目的-手段”机理机制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更具方向自觉性,也就是在经济发展各个环节所体现的“目的-手段”关系中,即使可能仍然含有工具理性的环节,也要更加具有体现人类发展本真价值所决定的“目的-手段”机理法则,这就要更自觉地服从本真价值取向,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即以更具方向自觉性的手段,实现更能体现本真理性的目的。

五、具有方向自觉性的新动能:两个一百年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这“两个一百年”目标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这就更加明确了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奋斗目标。为此,必须确立达到这一目标的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实际上是确定了改革与治理并重的思路,而且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达到更有效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的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此,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经验教训的精辟总结,按照这样的思路,可以更好地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目的-手段”机理的内在逻辑。

要实现这一“目的-手段”机理内在逻辑的自洽性,其关键之一是:经济发展必须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与旧动能所具有的高度工具理性主义特征相区别的是,新动能要更好地实现动力机制与目标达成之间的“激励相容”,即新动能中必须内在地含有本真理性的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是完全的工具理性主导。如前所述,新动能的根本性特征是“更具方向自觉性”。新动能不仅是强劲的“能量”,而且含有更能体现经济发展本真价值取向的自觉性“动机”,也就是说,新动能是具有更科学的目标指向的驱动能量。因此,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目的-手段”机理中,手段的选择本身必须有助于达成本真目的,发挥动能的手段作用,不可偏离正确的方向(本真目的)。例如,不能以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来追求GDP增长;不能以容忍腐败行为的方式来争取发展成就;不能以违反合规性的方式来激发进取的“活力”;不能以有损劳动者健康的方式获取收入、利润和财富;等等。可见,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目的”与“手段”之间必须具有激励相容的协调性,发展战略要有全面性和统筹性,目的与手段不可顾此失彼,更不能导致“目的”与“手段”的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将会发现,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手段”机理要求,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还难以胜任。所以,当我们庆祝中国40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时候,更要认识到,改革与开放仍然任重道远,推进改革开放还要冲破许多障碍和藩篱。特别是,中国40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已经改变了全球的经济和治理格局。面对中国的崛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承受巨大竞争压力,势必会调整战略,以应对挑战。其中,将特别关注中国国家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目的-手段”机理机制的演变方向。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制度的“目标-手段”机理机制的特色。中国以什么样的“手段”,要达到什么“目的”?因而将如何影响整个世界?这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新课题。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如此,那么,中国制度的“目的-手段”机理机制变化方向就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事情。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我们的国本国体,是不容外国干预的内政。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特别是中国主张和坚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那么中国经济的体制机制构建实际上就具有了国际性,许多东西是可以而且难免要进入国际谈判的。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布世界,中国的体制机制必须同世界接轨和协调。因此,在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目的-手段”机理机制的变迁,将在全球化环境中进展。中国将以自己经济体制的“目的-手段”机理机制的具体构建,告诉世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经济?我们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是什么样的贸易制度?我们的“一带一路”倡导的目的是什么,将采取怎样的实现手段?反过来思考,为了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现中国特色的“目的-手段”机理的“中国模

式”应如何进一步改革,使中国经济更加开放,以适应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对“自由贸易”或“公平贸易”的共同理解?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时刻,思考未来的改革开放走向,我们不仅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且更要有国际观念和全球化观念。绝不能忘记,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开放的,中国是在不断扩大开放的条件下推进改革,所以,“目的-手段”机理的进一步变迁更加需要体现“方向的自觉性”法则。因而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视角看,体现“目的-手段”机理机制的新动能,其“方向的自觉性”都要展现创新、自律、理智的基本特征:即在新时期,面对新形势,创新性是“目的-手段”机理机制以及新动能的核心特征;而绿色、低碳、协调等要求则是其不可或缺的自律特征;和谐共存、互利共赢、可持续等要求则是其更具包容性的理智特征。21世纪,各种国内和国际因素都会要求我们循着创新、自律、理智的路径,以更具方向自觉性的新动能,实现新时代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01版).

Transformation in the “Means-End Mechanism” of China’s Reform Journey

JIN Bei^{1 2}

(1.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People are always guided by an end in their actions,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ir end by resorting to a certain means. In the early 1980s, China embraced a market-based economy, which transformed the “means-end mechanism” of China’s economic operation. Market-based economy has completely reshaped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landscape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kind elevates from an instrumentalist concept of wealth – a concept that used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 to a concept of real values when market economy reaches a fairly advanced level. For China or for other economies, innovation, discipline and rationality are essential principles for new growth momentum based on “means-end mechanism”.

Key Words: economic reform; means-end mechanis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real values

责任编辑: 何 飞